

互联网嵌入如何赋能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

——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的实证分析

杨永娇

[摘 要] 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需引导社会救助对象通过社会参与摆脱福利依赖、承担社会责任。然而,受助者社会参与的内生动力极为不足,且现有的激励手段效果不佳。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背景下,有必要充分利用数字社会的红利寻找突破口,探索互联网的使用能否以及如何激活受助者社会参与的内在动力。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嵌入可以通过削弱主观社会地位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的限制而发挥重要赋能作用。研究揭示了技术何以通过心理赋能助推受助者打破志愿服务参与的自我限制,有助于优化受助者社会参与动员,促进受助者社会功能的健全,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关键词] 受助者;志愿服务;主观社会地位;心理赋能;互联网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的实现同参与者的责任意识紧密挂钩,其中的权利与义务相辅相成。换言之,对于共同富裕的参与者而言,除了“对自我的责任”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对他人的责任”。每个人既是共同富裕的受益者,也应该是共同富裕的推动者,这对于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重要的受益者——受助者或社会救助对象更是如此。^①受助者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受益群体,其参与志愿服务不仅能增强社会互助氛围,更能促进其自身社会融入和价值实现,形成“受助-助人”的良性循环,进而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②然而,受助者由于其相对弱势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被标签化为“被照顾对象”,其志愿服务参与率却长期处于低位,与庞大的志愿者规模形成鲜明对比。^③这一矛盾凸显了推动受助者参与志愿服务的紧迫性,亟须从理论和

[作者简介] 杨永娇,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公益慈善与社会政策。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低收入人口慈善帮扶的社区动员机制研究”(2024NDYB1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慈善帮扶的社会动员机制研究”(2024CDJSKXYGG06)。

① 马红鸽等:《共同富裕背景下慈善受助者捐赠行为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年第9期。

② 丁元竹、江汛清:《志愿活动研究类型、评价与管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87页。

③ 张佑辉:《第三次分配中的志愿服务:意义、机理与环境——基于北京市微观调查数据研究结论》,《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1年第2期。

实践层面探索有效路径。

虽然随着公民意识与助人文化的普及,部分受助者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引导下逐渐激活主体意识,实现从受助者向施助者的转变,但总体上该群体在参与志愿服务过程中仍面临显著障碍。一方面,心理赋能不足。受助者常因社会经济地位弱势被标签化为“被照顾对象”,其作为志愿服务供给者的主体性遭到忽视,参与渠道受限。^①同时,情感驱动特征使其对负面信息高度敏感,易因自我评价偏低形成“身份固化”心理,导致社会参与的主观失能,抑制其内生动力。^②另一方面,组织动员乏力。现有志愿激励过度强调无偿奉献,忽视志愿者的需求满足与动机实现,加之受助者对慈善理念理解有限,其参与行为多呈短期化、片段化特征。^③互联网技术虽在理论上为受助者参与志愿服务提供新可能,凭借低门槛、高互动的特性降低参与成本、增强社会联结,推动其角色转型,但也带来“双刃剑”效应。诸如“罗尔事件”、2024年中华儿慈会“陪睡门”等慈善丑闻经互联网放大后,不仅引发公众信任危机,更使受助者因羞耻与疑虑回避救助申请,甚至对志愿服务持观望或退缩态度,形成“信任受损-参与意愿降低”的恶性循环。这一现实困境迫切要求我们思考:在数字时代,互联网究竟将限制还是激活受助者的慈善参与?因此,如何在发挥技术优势的同时规避其负面效应,已成为推动受助者持续参与志愿服务的关键问题。

基于上述理论缺口和现实需求,本研究将探讨互联网技术何以通过心理赋能助推受助者打破志愿服务参与的自我限制。本研究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力求揭示互联网嵌入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的心理赋能机制,并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互联网嵌入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第二,面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的心理困境,互联网嵌入能否对受助者到施助者转变的心理机制有所影响?第三,在慈善信任危机频发的背景下,如何发挥技术优势赋能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为优化受助者志愿服务动员机制提供新决策依据,对推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社会救助与公益慈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 受助者的志愿服务参与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进步和公益事业发展,越来越多的受助者开始参与志愿服务。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转变不仅体现了个人成长和社会价值的提升,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弱势群体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态度。^④然而,学界普遍认为社会救助对象未能有效进行社会参与,受助者常自我强化“弱

① 杨永娇、杨玉婷:《超越“助人自助”:受助者到施助者的角色转换过程研究——以X社工机构的志愿服务为例》,《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2年第3期。

② 贾月:《论公益慈善中公众对受助者的伦理期待》,《学习论坛》2023年第5期;娄宇、谢晓非:《双向视角下受助者心理困境及其化解路径》,《心理科学》2024年第2期。

③ 张网成、曹仕涛:《注册而不参加志愿服务的原因分析:基于北京“志愿家庭”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年第2期。

④ 张承蒙等:《内涵式增权与外生性赋能: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残疾人社会支持网络构建》,《残疾人研究》2020年第1期。

势群体”刻板印象而产生习得性无助,在社会参与中较为被动,常表现为应付式参与和表演式参与,加深了福利依赖。^①也有学者指出,受助群体因“知恩图报”等传统伦理观念和互惠原则有较高慈善参与积极性,奉献意识、主观幸福感提升等成为推动其慈善行为的积极因素。^②关于影响因素,学界指出公共援助能为受助者参与慈善行为提供社会心理基础;^③但有学者基于制度逻辑理论认为政府救助可能抑制受助者的公益行为,^④社会救助还可能引发福利依赖问题,间接削弱其参与志愿服务的动力。还有学者基于角色转换理论探讨了志愿者与志愿服务组织在受助者角色重构与主体性提升中的关键作用。^⑤

(二) 志愿服务参与的心理机制

志愿服务参与行为是心理机制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从心理学视角看,个体的动机系统、自我效能感、社会认同及情绪调节能力共同构成了参与行为的内在驱动。^⑥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内在动机与外在动力通过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影响行为的持续性;心理资本理论进一步强调,自我效能感与情绪调节能力直接决定个体在服务中的投入程度。^⑦同时,主观社会地位即个体对自身在社会阶层中所处位置的主观认知,能够显著影响利他行为的倾向与持续度。^⑧关于主观社会地位如何影响志愿服务参与,目前学界存在两种主要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低主观社会地位者更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等利他行为,因其社会认知更具“情境主义”特征,更依赖他人与外部联结,往往通过利他行为寻求社会认同与关系补偿;相反,高地位者因心理资源充裕、更具“唯我主义”倾向,对利他行为的主动表现较少。^⑨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高主观社会地位者更可能参与利他行为,因其对资源损耗的敏感度较低,且在公开情境中更倾向展现慷慨;而低地位者因资源有限,更关注付出与回报的平衡,行为取向更偏向于交易式而非纯粹利他。^⑩

(三) 互联网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

作为技术赋能工具,互联网从多个维度积极促进个体参与志愿服务。首先,其在线特性显

-
- ① Laura Peck, et al., "A New Strategy for Reducing Selection Bias in Nonexperimental Evaluations, and the Case of How Public Assistance Receipt Affects Charitable Giving,"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21, 40(4); Yongzheng Yang, et al., "The Impact of Public Assistance Use on Charitable Giving: Evidence from the USA and China," *Voluntas*, 2021, 32(2); 慈勤英:《发展型社会救助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99-206页。
 - ② 马红鸽等:《共同富裕背景下慈善受助者捐赠行为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年第9期。
 - ③ Martin Leites, et al., "PROTOCOL: The Effect of Cash Transfers on Social Solidarity: A Systematic Review," *Campbell Systematic Reviews*, 2017, 13(1).
 - ④ 杨永娇、王彤:《公益行为何以传递?受助者公益行为的多重制度逻辑》,《公共行政评论》2023年第6期。
 - ⑤ 杨永娇、杨玉婷:《超越“助人自助”:受助者到施助者的角色转换过程研究——以X社工机构的志愿服务为例》,《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2年第3期。
 - ⑥ 熊伊伊、陈功:《社会机制视角下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困境及提升路径》,《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 ⑦ Richard Ryan, Edward Deci,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Classic Definitions and New Direction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0, 25(1); 何伟、臧小森:《志愿服务参与能激发大学生创业吗》,《浙江学刊》2025年第1期。
 - ⑧ Archana Singh-Manoux, et al.,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ts Determinant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Measures of Ill-health in the Whitehall II Stud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3, 56(6).
 - ⑨ Cameron Anderson, et al., "The Local-ladder effect: Social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 23(7); Paul Piff, et al.,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0, 99(5).
 - ⑩ Arie Nadler, Lily Chernyak-Hai, "Helping Them Stay Where They Are: Status Effects on Dependency/Autonomy-Oriented Help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4, 106(1).

著降低了慈善参与门槛,缓解了传统公益慈善中的“可达性”难题,使“冲动型捐赠”意愿更容易转化为实际的捐款或志愿服务行为。^①其次,区块链等技术以其去中心化、开放和不可篡改等特征,为重构慈善信任提供了新路径,促进了慈善参与。^②再次,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推动了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创新,改变了公众与信息连接方式,拓宽参与渠道,实现资源与需求的高效匹配。^③最后,互联网还可作为心理赋能媒介,通过增强社会互动帮助个体提升自我效能感、巩固社会网络,并强化集体认同和自我认同,从而激发持续参与的内在动力。^④

(四) 研究评述

现有研究虽成果丰富,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值得探究。第一,在研究对象方面,现有研究聚焦普通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并已构建多维心理机制框架,但存在明显研究断层,未充分回应共同富裕的时代要求而考虑受助者群体,尤其缺乏对该群体“受助-施助”角色转换过程中心理机制的实证研究。第二,关于互联网与志愿服务参与的关系,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关注技术维度的直接影响,忽视其与参与者心理机制的相互作用,对互联网嵌入如何在心理层面赋能志愿服务参与尚缺乏深入分析。为弥补不足,本研究将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出发,探讨互联网嵌入、主观社会地位,以及二者关系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并基于假设检验提出优化动员建议。

三、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技术系统理论

社会技术系统理论(Socio-Technical Systems Theory)强调技术与社会环境、组织结构以及个体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该理论认为,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塑造和影响社会结构、组织运作及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⑤在志愿服务领域,互联网作为新兴技术,不仅改变了信息获取和传播的方式,还深刻影响了受助者的社会参与行为和心理认知。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为探讨互联网嵌入如何赋能受助者的志愿服务参与提供了重要视角。其一,互联网技术能发挥心理赋能作用。该理论强调技术与社会环境、组织结构及个体行为间的互动。互联网通过信息触达、社交互动和反馈机制,深刻影响受助者的心理与情感。^⑥这与心理赋能的“自我效能感提升-自我认知重塑-行为动机激发”逻辑链条相吻合。^⑦其二,互联网嵌入能够突破传统赋能的结构性局限。传统资源赋能虽能提供物质支持,但难以解释受助者的角色转变。如前文所述,互联网技术通过

① Roger Bennett, "Impulsive Donation Decisions during Online Browsing of Charity Websites,"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2009, 8(2-3).

② 蔡明章等:《区块链技术在互联网公益众筹领域的应用研究》,《图书与情报》2020年第2期。

③ 周俊等:《数字技术与慈善事业的转型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

④ 陈海贝、卓翔芝:《数字赋能研究综述》,《图书馆论坛》2019年第6期。

⑤ Wiebe Bijker, et al.,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The MIT Press, 2012, 14-31; 史提夫·马修曼著,王志弘、高郁婷译:《技术与社会理论》,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第65-76页。

⑥ 罗茜、蔡文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偏见:主要表现、发生机制与治理路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⑦ 金盛华、张杰:《当代社会心理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0-233页。

促进社会连接,能改变受助者的主观认知,助力其从“受助依赖”到“自助互助”的思维跃迁。换言之,互联网通过心理激励和支持,能激发受助者的内在动机,促进其行为的持续。

(二) 互联网嵌入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的直接影响

互联网作为数字时代的关键媒介,构建的连接机制有效打破了公益组织的离散状态,使公益价值实现跨时空传递,提升了包括受助者在内的公众对公益慈善的认同感、共情和信任,从而促进慈善参与;互联网技术还显著提升了公益参与的便捷性,降低了参与风险,使受助者能够高效获取慈善参与资源;线上社交平台则通过传播公益理念、构建情感共同体,激发了受助者从“受助”到“互助”的角色转换意愿。^①然而,实践中互联网的信息扩散特性也放大了行业负面事件,对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产生消极影响。首先,慈善丑闻经互联网传播会损害组织声誉,而互联网具备社会濡染功能且能产生群同效应,加速负面信息扩散。其次,受助者等情感驱动群体更易受心理冲击,丑闻使其从“受益者”变为“质疑者”,甚至拒绝与慈善组织接触,削弱了参与志愿服务的社会支持网络。^②再者,外在力量具有“强迫”意味的动员容易使慈善组织面临舆论风波,从而抑制居民慈善参与的积极性。^③最后,公众对慈善透明的敏感度提升,且慈善组织的低信息透明度及低绩效等运营不善会显著降低受助者的志愿服务参与。^④此外,数字场域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与诈骗现象,降低了公众对公益慈善的认同度。^⑤

可见,互联网技术对受助者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互联网提高了慈善参与的可达性,对受助者的志愿参与行为可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如舆论风波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抑制了部分人群的慈善捐赠积极性。互联网作为当今社会的基础设施,其普及率已达79.7%,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⑥但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高度集中于儿童、农村老人等少数群体。然而,正是在这一高普及率背景下,互联网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的赋能价值却未充分发挥,其内在矛盾值得深究。因此,本研究基于互联网嵌入与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之间的复杂关联,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设:

H1: 互联网嵌入显著影响受助者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

H1a: 互联网嵌入会促进受助者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

H1b: 互联网嵌入会抑制受助者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

(三) 互联网嵌入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的心理赋能机制

1. 主观社会地位与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的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受助者的社会地位认知对其志愿服务参与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受助经历

① 李珮等:《公益组织的数字化转型与行动适应——数字赋能的视角》,《中国社会组织研究》2023年第2期。

② 原珂、赵建玲:《社区志愿服务发展成效、问题与对策探究》,《河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③ 李喜燕:《慈善义务的分离性困境及其制度克服的思考——从“舆论逼捐”说起》,《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④ 孙蔚、黄晓瑞:《ChatGPT引入互联网慈善的风险识别和应对策略》,《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⑤ 张奇林:《共同富裕目标下慈善事业的使命担当与发展路径》,《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3期。

⑥ 金歆:《截至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人民日报》,2025年7月22日第1版。

若能够使受助者意识到志愿服务可提升自我价值、改善他人对其社会角色的评价,其内在动机将增强,主观社会地位中的积极维度得以提升,从而更愿意参与志愿服务。另一方面,长期受助若缺乏正向反馈与能力建设,容易导致受助者产生“习得性无助”,削弱自我效能感,不仅直接阻碍社会参与,还会进一步固化其较低的社会地位认知,将自身困于“受助者”这一单一身份中,加剧社会融入困难,最终抑制志愿服务行为。^①这一矛盾反映出,受助经历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可通过主观社会地位的塑造与消解来实现;而受助者受经济困境与“贫困污名”的影响,容易形成消极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知。^②当前我国社会救助体系仍以事后物质援助为主,缺乏心理支持、能力提升与社会融入机制,^③难以打破依赖循环,反而强化“等靠要”心态,持续拉低受助者的主观社会地位,进而可能限制其志愿服务参与。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 主观社会地位显著影响受助者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

H2a: 受助者的主观社会地位越高越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

H2b: 与非受助者相比,受助者的志愿服务参与更容易受到主观社会地位的正向影响。

2. 互联网嵌入的调节效应

尽管互联网使用对受助者的志愿服务参与可能存在负面影响,但互联网嵌入可能通过调节主观社会地位的效应而发挥重要作用。主观社会地位作为个体对自身在社会层级中相对位置的主观评价,涵盖资源占有、社会尊重及自我认同等多维度感知。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启示,互联网嵌入可以从认知、情感、认同与动机四个层面弱化主观社会地位对受助者参与行为的约束作用。第一,通过信息获取,加强理性认知,削弱地位认知偏差:互联网提供广泛、跨阶层的信息,帮助受助者认识到志愿服务并非社会地位较高群体的特权,从而矫正因主观地位偏低而产生的“我不属于这里”的认知偏差,降低心理参与门槛;第二,通过社交互动,加强情感支持,缓解地位焦虑与归属剥夺:互联网促进低地位受助者融入跨阶层社交网络,在互动中获得情感支持与社会认可,缓解因主观地位感知低而产生的疏离感和自尊威胁,增强其社会归属与参与安全感;第三,通过自我意识与价值重塑,重构身份认同与自我效能:互联网为受助者提供自我表达和能力展示的空间,推动其从“低价值”的自我标签中脱离,转向以能力与贡献为基础的身份重建,且这一过程弱化了主观地位对自我价值的绑定,增强其参与志愿服务的能动性;第四,通过动机激发,提供正向反馈,突破自我设限。互联网的即时积极反馈,如认可、点赞,强化受助者参与行为的内在动机,使其更关注能力认同而非地位差异,从而抑制因主观地位低可能导致的行为退缩。^④相反,互联网嵌入低的受助者更易固化“低地位-低参与”的消极认知,抑制社会参与的主动性与持续性。

① Laura Peck, et al., "A New Strategy for Reducing Selection Bias in Nonexperimental Evaluations, and the Case of How Public Assistance Receipt Affects Charitable Giving,"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21, 40(4).

②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③ 张浩森:《以高质量社会救助制度筑牢共同富裕底板》,《学术研究》2022年第9期。

④ Carmen Leong, et al., "The Emergence of Self-organizing E-commerce Ecosystems in Remote Villages of China: A Tale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Rural Developm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 2016, 40(2); 高翔:《互联网使用、社会凝聚力与城市居民志愿服务参与》,《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11期;封铁英、刘娜:《数字时代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因此,本研究认为互联网嵌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主观社会地位与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的关系强度,并提出以下假设:

H3: 互联网嵌入对受助者主观社会地位与志愿服务参与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负向的调节效应。

四、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及样本

本研究使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2021年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该项调查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内容涵盖家庭、就业、经济状况、生活状况、社会保障、社会态度和志愿服务等模块。2021年的CSS完成了覆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592个村居的入户调查工作,收集合格调查问卷10136份。本研究最终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量为10136,并运用StataMP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 变量及分析方法

1. 因变量

志愿服务参与行为是本研究的因变量。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基于CSS问卷中“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志愿服务是指自愿、无偿地为家庭成员之外的人或事物提供的劳动服务,不是捐钱、捐物、献血等捐赠行为。您本人在近一年以来参加过以下哪些志愿服务?”这一题项进行测量。该题涉及13种志愿服务行为,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志愿服务行为类型,其中选项14是“以上都没有”。对此变量反向取值进行测量,将选择“以上都没有”选项的赋值为0,表示未参与过志愿服务,将选择其他选项的赋值为1,表示参与过志愿服务,由此区分出志愿服务的参与者和非参与者两类群体。

2.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分别为受助情况、主观社会地位和互联网嵌入情况。首先,“受助情况”基于CSS问卷中全家收入“政府、工作单位和其他社会机构提供的社会救助”这一题项进行测量,将这一项收入金额大于0的赋值为1,为受助者,其余则为0,为非受助者。

其次,“主观社会地位”基于CSS问卷中“您认为目前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这一题项进行测量,并将原有数据进行重新赋值,从低到高排序:将“下”赋值为1;“中下”赋值为2;“中”赋值为3;“中上”赋值为4;“上”赋值为5。

最后,“互联网嵌入情况”包括“是否嵌入”和“嵌入程度”两种情况,分别基于CSS问卷中“现在互联网比较普及,大家可以用手机和电脑上网,您平时上网(比如:用电脑或者手机看新闻、用微信等活动)吗?”“您上网进行下列活动的频率是”这两个题项分别进行测量,前者如果回答是赋值为1,相反则赋值为0,后者则采用频率“几乎每天”赋值为5,“一周多次”赋值为4;“一周至少一次”赋值为3;“一月至少一次”赋值为2;“一年几次”赋值为1;“从不”赋值为0。

3. 调节变量

为探究互联网技术何以通过心理赋能助推受助者打破社会参与自我限制，将“互联网嵌入情况”作为调节变量，即社会公众对互联网服务与功能的实际使用情况，以此检验心理赋能情况。“互联网嵌入情况”（使用赋值为1，没使用赋值为0）的具体编码方式如前文所述。

4.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已有研究证实与志愿服务参与相关的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定量模型，包括年龄（取平方）、性别（男=1，女=0）、受教育情况（未上学/小学=1，初中=2，高中/中专=3，职高技校/大学专科=4，大学本科/研究生=5）、婚姻状况（有配偶=1，无配偶=0）、户籍性质（农业户口=0，非农业户口/居民=1）、是否是党员（是=1，否=0）、家庭收入（取对数）。表1报告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0136）

被解释变量	统计指标	百分比 / 均值	控制变量	统计指标	百分比 / 均值
志愿服务参与	0. 否	85.81%	性别	0. 女	55.95%
	1. 是	14.19%		1. 男	44.05%
解释变量	统计指标	百分比 / 均值	年龄平方		2382.62
受助情况	0. 否	93.17%	受教育情况	最高学历（1-5）	2.42
	1. 是	6.83%	婚姻状况	0. 无配偶	21.64%
互联网嵌入_程度	互联网使用频率	0.68		1. 有配偶	78.36%
互联网嵌入_是否	0. 否	31.87%	户籍性质	0. 农业户口	65.36%
	1. 是	68.13%		1. 非农业户口 / 居民	34.64%
主观社会地位	自评（1-5）	2.34	政治面貌	0. 无 / 其他	89.94%
				1. 是中共党员	10.06%
			家庭收入对数		10.92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5. 分析模型

由于志愿服务参与行为是二分类变量，故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嵌入（是否）及互联网嵌入程度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直接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互联网嵌入在主观社会地位与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关系之间的调节效应。

五、分析结果

（一）受助者的互联网嵌入特征

为深入理解互联网嵌入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首先对受助者、非受助者及全样本三类群体的上网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从上网率来看，受助者群体的上网率（55.35%）明显低于非受助者群体（69.07%）及全样本水平（68.13%），这一结果主要源于受

助者在经济条件、教育水平或社会资源获取能力上的限制,导致其互联网接入机会相对较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上网频率方面,受助者群体却表现出较高的活跃度,采用频率赋值(1—5),受助者平均上网频率(3.873)均高于非受助者群体(3.850)及全样本平均水平(3.851)。这种“低上网率—高上网频率”的矛盾现象,揭示了受助者群体在互联网使用上的独特性:尽管整体接入率较低,但一旦接入互联网,受助者往往表现出更高的使用强度和依赖性。

(二) 受助情况、互联网嵌入与主观社会地位对全样本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

在模型估计前,本研究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各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值均小于2,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2报告了受助情况、互联网嵌入、主观社会地位对全样本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影响的回归模型结果。模型2(是否嵌入)和模型3(嵌入程度)分别检验了互联网嵌入的两种不同形式对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模型2的结果显示,互联网嵌入(是否)对志愿服务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但系数不显著。而模型3则显示,互联网嵌入程度对志愿服务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0.118($p < 0.001$)。这表明在全样本中,上网的程度这一“量变”因素对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显著。模型5显示了受助情况与主观社会地位的交互项对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系数为0.233($p < 0.1$)。这说明对于志愿服务参与行为而言,受助者比非受助者更容易受到主观社会地位的正向影响,支持了假设H2b。

表2 受助情况、互联网嵌入、主观社会地位对全样本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受助者	0.233 ⁺ (0.125)				-0.275 (0.338)
互联网嵌入_是否		0.133 (0.090)			
互联网嵌入_程度			0.118*** (0.023)		
主观社会地位				0.221*** (0.036)	0.206*** (0.037)
受助者 * 主观社会地位					0.233 ⁺ (0.132)
年龄(取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性别(男)	0.349*** (0.063)	0.340*** (0.063)	0.343*** (0.063)	0.364*** (0.063)	0.362*** (0.064)
受教育情况	0.238*** (0.032)	0.228*** (0.032)	0.177*** (0.034)	0.225*** (0.032)	0.227*** (0.032)
婚姻状况(有配偶)	-0.101 (0.080)	-0.121 (0.080)	-0.128 (0.079)	-0.121 (0.080)	-0.104 (0.081)
户籍性质(非农业)	-0.037 (0.071)	-0.050 (0.071)	-0.070 (0.071)	0.502*** (0.092)	-0.029 (0.071)
政治面貌(党员)	0.544*** (0.092)	0.538*** (0.092)	0.506*** (0.092)	0.502*** (0.092)	0.505*** (0.093)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家庭收入（取对数）	0.083* (0.034)	0.071* (0.034)	0.040 (0.034)	0.037 (0.034)	0.043 (0.034)
常数	-3.185*** (0.380)	-3.127*** (0.376)	-2.974*** (0.374)	-3.098*** (0.374)	-3.166*** (0.380)
N	8785	8785	8785	8705	8705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三）互联网嵌入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直接影响

表 3 基于受助者的有效样本，报告了互联网嵌入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直接影响的回归模型结果。模型 6 检验了互联网嵌入（是否）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其系数为 -0.752 ($p < 0.05$)，而模型 7 则显示互联网嵌入（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在受助者样本中，互联网嵌入对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与全样本存在显著差异。受助者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对“是否上网”这一“质变”因素更为敏感。总体而言，可以得出互联网嵌入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具有显著负面影响，故假设 H1a 不成立，H1b 得到验证。

表 3 互联网嵌入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直接影响

变量	模型 6		模型 7	
	B	SE	B	SE
互联网嵌入_是否	-0.752*	0.379		
互联网嵌入_程度			-0.105	0.123
年龄（取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性别（男）	0.669*	0.287	0.662*	0.285
受教育情况	0.239	0.158	0.238	0.163
婚姻状况（有配偶）	-0.214	0.367	-0.264	0.364
户籍性质（非农业）	0.196	0.322	0.174	0.321
政治面貌（党员）	0.488	0.559	0.436	0.553
家庭收入（取对数）	0.602***	0.153	0.585***	0.157
常数	-7.068***	1.707	-7.223***	1.707
N	302		302	

注：（1）SE 为标准误；（2）***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四）互联网嵌入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调节效应

表 4 揭示了互联网嵌入在主观社会地位与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各变量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方向依然与模型 5 保持一致，只是影响系数和显著性稍有变化。模型 8 检验了主观社会地位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其系数为 0.259 ($p < 0.1$)，表明主观社会地位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H2a 得到验证。模型 9 显示互联网嵌入（是否）与主观社会地位和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其系数为 -0.522 ($p < 0.1$)，调节效应图见图 1。模型 10 则显示在受助者群体中，互联网嵌入（程度）并未对主观社会地位与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进一步说明互

联网接入与互联网使用程度在影响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上的差异。总体而言，互联网嵌入可以通过削弱主观社会地位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的限制，进而强化其志愿服务参与，因而假设 H3 得到证实。

表 4 互联网嵌入情况对主观社会地位与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

变量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B	SE	B	SE	B	SE
主观社会地位（SSS）	0.259 ⁺	0.155	0.573 [*]	0.230	0.498 [*]	0.221
互联网嵌入 _ 是否			0.330	0.777		
互联网嵌入 _ 程度					0.116	0.234
互联网嵌入 _ 是否 *SSS			-0.522 ⁺	0.306		
互联网嵌入 _ 程度 *SSS					-0.114	0.083
年龄（取平方）	-0.000	0.000	-0.000 ⁺	0.000	-0.000	0.000
性别（男）	0.688 [*]	0.289	0.758 ^{**}	0.296	0.741 [*]	0.293
受教育情况	0.187	0.156	0.236	0.161	0.249	0.165
婚姻状况（有配偶）	-0.194	0.371	-0.129	0.388	-0.171	0.382
户籍性质（非农业）	0.255	0.326	0.336	0.331	0.319	0.330
政治面貌（党员）	0.321	0.556	0.514	0.569	0.456	0.566
家庭收入（取对数）	0.460 ^{**}	0.154	0.504 ^{**}	0.160	0.504 ^{**}	0.162
常数	-6.676 ^{***}	1.689	-7.155 ^{***}	1.760	-7.308 ^{***}	1.751
N	298		298		298	

注：（1）SE 为标准误；（2）***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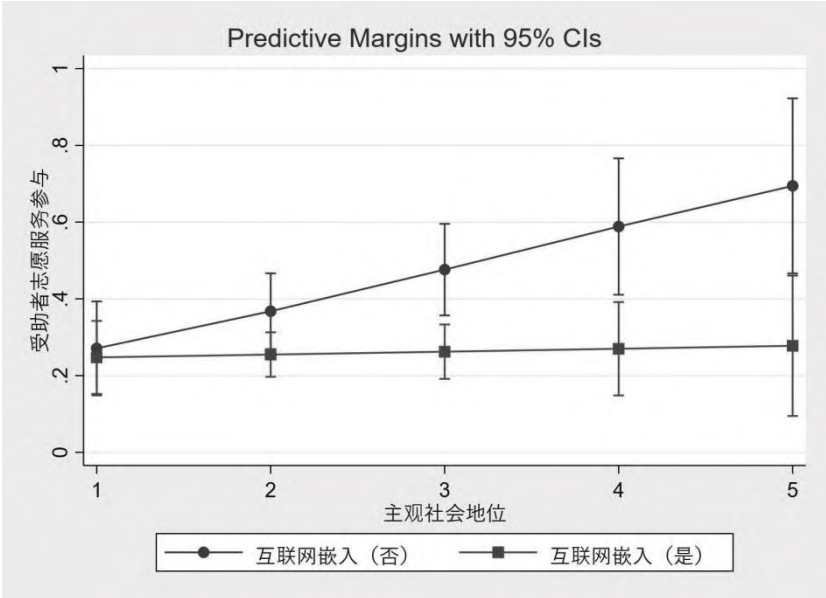


图 1 调节效应图

（五）稳健性检验

由于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测量误差或双向因果等问题，扰动项与内生解释变量之间

可能存在相关性，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为识别互联网嵌入与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之间的因果效应，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IV），通过引入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但外生于模型的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偏误。本研究选择“社区上网人口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是受助者所在社区或村居内使用互联网的样本数占社区总样本数的比例。该工具变量的选择基于以下两点理论依据：一是“社区上网人口比例”能够反映区域内互联网嵌入的整体水平，与个体层面的互联网嵌入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二是研究主要利用社区层面的观测值作为对个体不可观测因素的代理，并参考已有研究方法进行识别。^① 鉴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本研究选择 IV-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表 5 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对互联网嵌入（是否）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为模型的有效估计奠定了基础。在第二阶段回归中，使用工具变量拟合值替代内生变量，以进一步估计主要变量对社会参与行为的因果效应。模型 11 显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受助者的互联网嵌入对其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H1b。此外，瓦尔德检验（Wald test）结果显示，模型的检验值为 4.27，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进一步支持了工具变量法的有效性，表明模型能够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表 5 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1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B	SE	B	SE
互联网嵌入_是否			-2.045*	0.885
社区上网人口比例	0.006***	0.001		
年龄（取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性别（男）	0.013	0.045	0.404*	0.185
受教育情况	0.034	0.025	0.214+	0.113
婚姻状况（有配偶）	0.050	0.056	-0.065	0.240
户籍性质（非农业）	-0.044	0.056	0.177	0.218
政治面貌（党员）	0.089	0.095	0.525	0.389
家庭收入（取对数）	0.053*	0.022	0.466***	0.114
常数	-0.069	0.252	-3.954***	1.065
F	27.37***			
Wald			4.27*	
N	302		302	

注：（1）SE 为标准误；（2）*** 表示 $P < 0.001$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

为了进一步分析互联网嵌入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将受助者样本分为互联网使用者和非互联网使用者两组，并进行回归分析，所有自变量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VIF < 2$ ）。表 6 显示了“互

① 黄荣贵、桂勇：《集体性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基于多层次数据的分析》，《社会》2011 年第 6 期。

联网使用者”和“非互联网使用者”的主观社会地位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互联网使用者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而非互联网使用者的影响系数为 0.603（ $p < 0.05$ ）。这进一步表明互联网嵌入可以削弱受助者主观社会地位与其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强度，从而验证了 H3。

表 6 互联网嵌入分组回归：主观社会地位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

变量	互联网使用者		非互联网使用者	
	B	SE	B	SE
主观社会地位	0.083	0.210	0.603*	0.286
年龄（取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性别（男）	0.417	0.363	1.872**	0.609
受教育情况	0.355 ⁺	0.190	-0.200	0.465
婚姻状况（有配偶）	0.292	0.556	-0.528	0.699
户籍性质（非农业）	0.335	0.381	0.424	0.691
政治面貌（党员）	0.875	0.677	-1.316	1.419
家庭收入（取对数）	0.312	0.201	0.894**	0.315
常数	-5.172*	2.105	-10.918**	3.629
N	178		120	

注：（1）SE 为标准误；（2）*** 表示 $P < 0.001$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构建“技术－心理－行为”分析框架，并利用 CSS 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嵌入对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嵌入的作用具有群体异质性：在全样本中，互联网使用程度这一“量变”因素显著促进志愿服务参与；然而在受助者群体中，是否使用互联网这一“质变”因素反而降低其参与概率，而使用程度则无显著影响。这一抑制效应源于该群体特有的脆弱性，一定程度印证了前文的观点。作为高度依赖外部资源的群体，互联网所扩散的慈善负面信息对其造成的冲击远大于普通公众，不仅触发其“生存焦虑”，使其从受益者逆转为防御者，可能因担忧资源断裂而主动拒绝参与，也因其有限的信息甄别能力与社会资本更易被负面信息“濡染”，难以获取多元信息以平衡认知；加之其参与行为原本依赖外部组织动员与情感驱动，互联网加剧的信任危机进一步瓦解这一基础，最终导致其从“谨慎参与”滑向“彻底退出”。这表明数字技术风险存在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异，受助者成为承受最大负面溢出效应的脆弱节点。

与此同时，互联网嵌入在受助者主观社会地位与志愿服务参与之间呈现显著负向调节效应。尽管主观社会地位本身对参与存在正向影响，但受助者因陷入认知低位困境，实际促进作用有限，其根源在于长期依赖本地有限资源形成的狭隘比较框架，导致产生“无力贡献”的自我定位。互联网通过重构社会认知场域破解该困局：一方面打破封闭比较框架，使其暴露于多元社会经

济样本中,意识到困境的普遍性,淡化相对剥夺感,弱化地位对行为的约束;另一方面提供身份再造的数字通路,借助匿名性与垂直兴趣社区剥离固有污名标签,以技能、知识等非地位要素重塑“贡献者”身份并获得即时认可,从而阻断因地位感知引发的参与退缩。互联网由此为受助者构建了替代性社会场域,帮助其规避本地地位压迫、实现自我价值再认证,进而激发参与能动性。

在理论贡献上,本研究将数字技术与心理机制相结合,解释了互联网赋能受助者社会参与的理论逻辑,为理解在数字社会助推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提供了新的学理支撑。同时,本研究揭示了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社会后果取决于其嵌入的社会制度和权力结构,进一步回应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在缺乏健全监管、透明文化和高度信任的社会环境中,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反而可能助长社会风险,抑制合作行为。因此,在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本研究提倡从“资源动员”到“风险规避”的范式转变。传统的集体行动和社会参与理论强调“资源动员”,而在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数字时代,个体的首要考量可能不再是“如何参与”,而是“如何规避风险”。尤其是对于受助者而言,规避道德、财务和心理风险成为行为决策的主导逻辑。

因而,在实践层面上,本研究强调在积极推进“互联网+公益”模式的同时,必须同步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数字治理体系、透明度机制和信任修复机制,以系统性地回应数字时代公众参与中可能出现的信任危机与伦理挑战。尤其对于受助者群体,应依托互联网技术从双重路径推动其实现从“受助者”向“施助者”的积极转变。一方面,通过直接赋能为其构建安全、低门槛的参与环境。公益平台可开发如“云端助教”“线上导读人”等轻型志愿服务模块,将宏大使命转化为易实施的微任务,并借助“爱心时长”累计与受益者反馈视频等可视化机制实时呈现公益成效,同时通过严格的志愿者资质审核、服务过程追溯降低风险感知,从而有效缓解其参与前的心理防御。另一方面,则需深化心理层面的赋能,通过算法推送多元化、去阶层化的公益叙事,培育垂直社群,如“宝妈互助团”和“手艺助人圈”,强化其基于技能的身份认同,并依托电子证书、社区积分和公开致谢等精神激励形式,使其贡献获得超越本土社会网络的认可,从而系统性弱化因主观社会地位限制所带来的自我设限,最终将其参与动机从“地位驱动”彻底升华为“价值驱动”,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认同的双重重构。

本研究作为探索性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为未来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方向。首先,本研究从互联网心理赋能角度探讨了受助者志愿服务行为的发生逻辑,未来研究可在主观社会地位之外考虑更多的心理因素,例如自我效能感和社会信任等,更全面地揭示技术与心理要素在推动受助群体志愿服务参与中的互动。第二,由于受助者的志愿服务行为尚处于“从无到有”的初级阶段,本研究聚焦其参与与否这个最初级的层面,未来可考察受助者志愿服务参与的类型、时长等参与强度,亦可考虑其他形式的社会参与,如慈善捐赠或者社区治理,有助于更全面地描摹受助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图景。第三,鉴于受助者群体的异质性,影响该群体志愿服务行为的因素和机制或存在内部差异,未来可扩大样本量,细化群体与行为分类,更全面、深入地分析其志愿服务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制。

How Does Internet Embeddedness Empower Recipient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Servi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ocio-Technical Systems Theory

Yang Yongjiao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Achieving more tangible progress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requires guiding social assistance recipients to overcome welfare dependency and assum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social participation. However, recipients often lack endogenous 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and existing incentive measures have proven ineffective. In the context of widespread Internet use, it is essential to leverage the dividends of the digital society to explore whether, and how, Internet embeddedness can stimulate recipients'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voluntary service. Drawing on socio-technical systems theory and data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this study finds that Internet embeddedness plays an important empowering role by mitigating the constraints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on recipient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service. The findings further reveal how technology fosters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enabling recipients to break through self-imposed 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strategies for mobilizing recipient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service, strengthening their social functions, and ultimately advancing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recipients; voluntary service;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nternet

(责任编辑:高静华)